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

摘要 韦棣华、沈祖荣和裘开明有着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又都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划时代先驱者。作为一代图书馆人,他们发挥了崇高的图书馆精神,把一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他们为图书馆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是跨越时空的。参考文献 17。

关键词 韦棣华 沈祖荣 裘开明 图书馆精神 文华公书林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美国东亚图书馆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As epoch-making pioneers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Mary Elizabeth Wood, Shen Zurong (Shen Tsurjung) and Qiu Kaiming (Ch'iu K'ai-ming) have a comm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a common religious belief. As a generation of librarians, they developed lofty library spirit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librarianship. Their spirit has values beyond space and time. 17 refs.

KEY WORDS Mary Elizabeth Wood. Shen Zurong. Qiu Kaiming. Library Spirit. Boone library. Boone Library School.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U. S. A.

CLASS NUMBER G250

裘开明先生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东亚图书馆先驱和华美图书馆学家。因为我将会在即将撰写的《裘开明先生评传》中全面地描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总结裘开明先生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乃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卓越贡献,并客观地评价裘开明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对西方汉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所以,这里不准备详细地阐述裘开明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不仅是因为精神既是永恒的,又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且还是因为精神既是最令人感动的实在,也是最能够催人奋进的力量。下面,我将从“三位一体”、“三维一体”和“跨越时空”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

1 “三位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历史遇合

哈佛燕京图书馆创始于位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总馆——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汉文文库”(Chinese Collection,又称“汉文图书馆”或“中文图书馆”),发展于位于博伊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的“汉和文库”(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和“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兴盛于位于神学路(Divinity

Avenue)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每当我走到哈佛燕京前面看到路标上“神学”(Divinity)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位一体”(Trinity)这个单词,有时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在基督教教义中“三位一体”(Trinity)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不信教,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今天哈佛燕京图书馆坐落在神学路上会不会是某种因缘的结果?我不想就此做一些“唯心主义”的求证,但是,我不得不说明的是:在许多方面,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确是“三位一体”的。也许,并非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很熟悉太平洋彼岸的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们又怎么会与太平洋此岸的裘开明先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1864~1931),1861年8月22日诞生于美国纽约州巴达维亚(Batavia)附近的一个名叫埃尔巴(Elba)的小镇。1889年,韦棣华女士走出家门,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担任纽约州巴达维亚“理奇蒙特纪念图书馆”(the 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 Batavia, New York)的第一任馆长;1899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原因,韦棣华女士只身赴中国武昌探望其幼弟韦德生(Robert Wood)牧师,后因怜惜武汉民众的疾苦和教育条件的不足,遂决定留在中国,并立志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提高民众的智识。她于1910年创办了中国第一

个真正具有现代公共图书馆意义的图书馆——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 请注意“公书林”这个特别名词的独特意味);1920年与沈祖荣先生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 以下简称“文华图专”);1924年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并因此于1925年发起并促成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1927年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英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其它14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31年5月1日因病在武昌逝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山鼻祖,韦棣华女士曾被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1]。

沈祖荣先生(1884~1977),1884年诞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少年时由于家境贫寒一直无缘读书。1903年获湖北宜昌圣公会教堂推荐,只身到武昌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书院(1916年组升为文华大学)免费求学;1910年文华大学毕业后,因深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影响,毅然决定放弃一切升官发财的机会,投身于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担任协理(副馆长),致力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1914年受韦棣华女士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留学,开创了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先导;1917年学成回国后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与韦棣华女士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担任文华公书林总理(馆长)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长达30余年;1925年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1929年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第一次大会,揭开了中国图书馆人参与国际图书馆活动的序幕;1941年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开创了中国档案学教育的先河……;1977年2月于江西省庐山逝世。沈祖荣先生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占20世纪上叶中国图书馆专业人才之大半,且遍及海内外,被海内外共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2]。

裘开明先生(Alfred Kaiming Chiu, 1898~1977), 1898年生于浙江镇海县,1912年()就读于湖南长沙的美国圣公会学校——St. James Middle School(湘雅中学);1915年被美国圣公会推荐免费攻读文华中学,1918年又被推荐免费攻读文华大学;1920年因深

受韦棣华女士精神的感动在文华图书科创办时改修图书馆学,1922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仅3人);1922年文华图书科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24年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1925年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同时继续完成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一年实习课程),并分别于192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于193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the Custodia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自1931年起一直担任美国第一个东亚图书馆(请注意Collection与Library之间的差别,以及Custodian、Curator和Librarian之间的差别)——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图书馆馆长(the Librarian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在担任了38年馆长退休后应邀赴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图书馆创办其东亚图书馆;1966年又应邀赴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1977年11月于剑桥逝世,被誉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之领袖”^[3]。

我之所以说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是“三位一体”的,是因为他们三位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其一,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具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

早在1903年沈祖荣先生就读文华书院时,韦棣华女士就是沈祖荣先生的英文老师。自1910年起,沈祖荣先生开始追随韦棣华女士从事图书馆事业。从早期的师徒式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来看,沈祖荣先生可以算是韦棣华女士的开门弟子。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师生关系具有与通常的师生关系迥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韦棣华女士不仅是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老师,而且还一直是沈祖荣先生从事图书馆事业和研究图书馆学的导师。另一方面,沈祖荣先生既是韦棣华女士的学生,又是韦棣华女士的最忠实的事业继承人,还是韦棣华女士最信赖的朋友。

裘开明先生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于1920年在武昌县华林正式开始设坛教学的开门弟子。作为“文华图专”的第一届毕业生和“文华图专”第一个最忠诚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裘开明先生与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这种师承关系同样也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师承关系,而是一种决定人生和理想的师承关系。所以,在研究裘开明先生的过程中,我们不可以忽视这种师承关系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图书馆学启蒙教育和精神感召,我们就无法想象裘开明先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人生抉择。

1922年裘开明先生在“文华图专”毕业后的第一个图书馆工作职位——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是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推荐的。裘开明先生虽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只做了两年多的馆长就到了美国,但是,裘开明先生对这份荣誉一直十分珍惜,他在他后来的论著中经常并列题写“原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两个职务,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人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之风渐盛,而尤以赴著名大学者为多,为什么裘开明先生要选择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除了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推荐以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沈祖荣先生的影响。可以说,裘开明先生是沿着沈祖荣先生十年前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学之路而到美国的。这的确是一件回味无穷的故事。

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图专”一直讲授的课程是“图书分类法”和“图书编目法”,这些课程对裘开明先生影响深远。我们只要看一看裘开明先生的三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力作《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1938~1940年)和《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年),就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深远性。

裘开明先生对他的老师一直十分尊崇。在1931年韦棣华女士逝世时,他专门撰写了《韦师棣华女士传略》一文以纪念韦棣华女士。30年后他又专门为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 ~ 1950* 撰写了“Mary Elizabeth Wood”的千言条目,其对韦棣华女士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在20世纪30年代,裘开明先生曾先后两次回中国,虽然其主要目的是赴河北省做农村调查和在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及燕京大学图书馆校勘自己的著作,但是,他每次都不远千里专程到武昌“文华图专”去拜访他的老师沈祖荣先生。那时,裘开明先生已经是在海内外具有相当影响的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馆长,但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的报道一直称裘开明先生为“裘开明同学”,那种师生的情谊同样是跃然纸上,充满了温馨。

其二,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

位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均信仰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如果仅从基督教信徒这种共性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因为在美国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的确是太多和太普遍了。但是,当这种宗教的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并产生共同的图书馆精神的时候,当这种共同的信仰作用到人生之中并导致共同的人生道路的时候,这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信仰问题。

韦棣华女士赴中国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信徒,但是她到了武昌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大学以后,由于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或者说她所做的一切因应了基督教“服务大众”的理念,后来武昌美国圣公会曾授予韦棣华女士“世俗传教士”(Lay Missionary)的称号。

沈祖荣先生17岁时才开始读书,如果没有武昌美国圣公会提供的读书机会,他后来恐怕也不会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信仰基督教,并将基督教之精神发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以“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智慧与服务”精神且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人才。但是,不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只能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埋藏在心里。

裘开明先生由于从湖南长沙湘雅中学到湖北武昌文华大学一直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他信仰基督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受到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的“智慧与服务”之精神的影响,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在文华大学3年级时为什么会改选当时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学的冷门图书馆学专业。在座的各位专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么样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裘开明先生在192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以后要继续到哈佛大学来深造而不是其他的大学?为什么裘开明先生在攻读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以后不去谋求待遇更为优厚的经济方面的职位而要投身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之中?

我原来对这两个问题也比较纳闷,但是当读了裘开明先生自己写的《一个馆长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Librarian*)以后,我开始有点明白个中的原委。在这篇回忆录中,裘开明先生专门写了一段看似多余却蕴涵着“玄机”的文字:“1924年秋,我受厦门大学的派遣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图书馆

学。到达美国后,我首先就来到了剑桥和哈佛拜访我以前的老师James Muller博士,他是我在文华大学时的‘德语’和‘美国史’任课老师,后来做了(剑桥)‘圣公会神学院’(the Episcopal Theological School)的圣公会历史(Church History)教授。那时,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哈佛来读书。^[4]这种心迹的表露可以算做是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

由于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hurch)的第7任教区长 Rector Paddock 牧师的影响,裘开明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是该教堂的忠实教友。他有三个小孩是在这个教堂洗礼的,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是在这个教堂结婚的。我已先后数次访问过圣詹姆斯教堂,在教堂的法衣室(Vestry)有一扇彩色玻璃窗是裘开明先生的儿女专门设立纪念其父亲的。这扇彩色玻璃窗上彩绘的是玫瑰花,与旁边的另一扇绘有百合花的彩色玻璃窗交相辉映。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采用比较普遍的宗教人物像,而要使用与众不同的玫瑰花作图案。后来,读了《圣经》所罗门颂歌“(Song of Solomon)中的‘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我开始有点醒悟:所罗门是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不正是以智慧而著称的吗?!后来,我又到奥本山公墓(Mt. Auburn Cemetery)去祭拜过裘开明先生。裘开明先生的墓碑上除了雕刻有十字架以外还专门刻有“教会”二字。我想我讲了这些见闻,差不多可以说我要说明的问题了。

其三,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同是划时代的先驱者。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渐渐开始重视对杰出图书馆人物的研究,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反观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于杰出图书馆人物的研究,虽然不能说不重视,但是“问题”也不少。例如:杜威(Melvil Dewey)是世界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但是,美国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完整的杜威传记;相反印度倒是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Ranganathan)的研究要充分得多。我觉得:在20世纪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应该对20世纪的图书馆人,尤其是杰出的图书馆人给予充分的评价。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常常比较强调“时势造英雄”这一面,但往往容易忽视“英雄造时势”这一面。从“英雄造时势”这方面来看,杰出历史人物的贡献往往是具有标志性的。对于这种标志性的贡献,人们常常会用“里程碑”来形容。当然,就“历史的里程碑”而言,它也有10年、20年、50年等不同时

间距离的里程碑之分。或者说,“里程碑”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的差别。

我觉得,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对于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是“划时代性”的,我在前面列举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么多“第一”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一项事业的开创者或者“第一人”,他当然不仅仅代表着一个阶段的开始,而且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划时代的标志。1854年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他标志着中国人留美历史的开始。1879年戈鲲化应邀到哈佛大学来讲学成为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标志着哈佛大学汉学(或者亚洲学)研究的开始。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三位在图书馆事业方面正是这种划时代的先驱者。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不仅是划时代的先驱,而且又都是一代宗师。我时常在想:英文的“Confucius”(孔子)和“Mencius”(孟子)这两个圣人的名字的确是翻译得好,因为它的直接中文意思就是“孔先师”和“孟先师”。从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历史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在英文上采用“Woodcius”(韦先师)、“Sengcius”(沈先师)、“Chiucius”(裘先师)这些新名字尚值得研究,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个报告中称他们为“女士”或“先生”,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女士”“先生”,而是指“宗师”或“大师”。

2 “三维一体”——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理想唱和

当我用全方位的视野来审视“图书馆世界”(the Library World)的发展时,我发现:“图书馆世界”是一个很有趣的“三维空间”——一个由“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组成的“三维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者对这“三维”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的差异最终必然导致他们所反映的“图书馆世界”的差异。在这里,我不妨借用一点“数学语言”来描述一下这个“三维世界”及其特点。

第一维(“X维”)是“图书馆事业”,包括图书馆、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学教育等等。通常,图书馆学研究者比较注重对这一维的研究,但是,如果只局限于这一维的研究,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

界”的发展只是一种“线性历史”。这种“线性历史”往往使“图书馆世界”的发展显得单调和枯燥乏味。

第二维(“Y维”)是“图书馆人”,包括图书馆从业者、图书馆学教育者和图书馆学研究者等等。在“图书馆世界”的发展中,“图书馆人”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图书馆学研究者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人”结合起来研究时,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将是一种“平面历史”。这种“平面历史”自然要比“线性历史”全面生动得多。

第三维(“Z维”)是“图书馆精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图书馆人也许具有不同的“图书馆精神”,但是这些不同的“图书馆精神”总是有着许多的共性。我时常将中国的“图书馆精神”概括为“四爱”——“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精神”概括为“智慧与服务”,虽然这些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当图书馆学研究者从“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三维空间来研究“图书馆世界”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将是一种“立体历史”。这种“立体历史”不仅能够全方位地展现“图书馆世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展现“图书馆世界”的发展动力。

在“图书馆世界”中并非所有的“图书馆人”都具有“图书馆精神”。只有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并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人”才具有真正的“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对人生理想的孜孜追求正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三维一体的生动演绎。

作为一个美国人,韦棣华女士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大陆的图书馆学研究者习惯于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传教士之使命,并由此推导出韦棣华女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马前卒”。这当然是幼稚和荒谬的。虽然韦棣华女士曾经拥有“世俗传教士”的称号并在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创办了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专,但是,她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摆脱教会的影响,并最终使其图书馆事业完全独立于教会之外自行发展。所以,我们不可以将韦棣华女士献身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归结为传教士之使命。

可以说,韦棣华女士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完全是因为人生理想的追求。这种人生理想的追求首先是良知与道德的自觉与弘扬,然后是生命与理想的归属与倾注。1899年,韦棣华女士带着惶恐的心理第一次到达中国探访其弟弟时,她亲眼所见的不是外国媒体所渲染的那种充满仇恨与血腥的中国,而是一个贫穷落后与民智未开的中国。因为有感于武汉民众生活的疾苦和教育程度的低下,韦棣华女士颇有救济之意,遂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以尽个人的微薄之力去帮助武汉的民众。起初,韦棣华女士只是在文华书院担任英语教师,后来她发现教书无法实现匡济民众的初衷,于是,开始办理公共图书馆,使普通民众均有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从那时起,韦棣华女士就已经立志通过献身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来实现其服务中国民众的人生理想。

其后,韦棣华女士的这种“创办人之精神”一直在不断地发扬光大。对此,毛坤先生在1930年时就已经做过比较准确的说明:“创办图书科者,美国韦棣华女士也。女士来华服务已30年。初十年任教职于文华大学;10年后创办文华公书林;20年后创办文华图书科。女士一生志愿,在辅助中国,发扬文化。其首先着力之点,为图书馆事业。欲发展图书馆事业,首在人材之养成;故创办图书科以为根基。对于办理之人,则先期补助沈祖荣胡庆生两先生留学美国专学图书馆学以便归国办理。对于经费则中外奔走,劝募维持;辛苦倍尝,十年一日。其坚韧卓绝,远思长虑之精神,不可及也。”^[5]

1939年12月,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评价白求恩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我以为:虽然韦棣华女士来华的情形与白求恩有所不同,但是,韦棣华女士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尤其是她的精神,较之白求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期待续)